

客家研究輯刊

THE PERIODICAL OF HAKKA RESEARCH

2007 年第 1 期(总第 30 期)

NO. 1 2007(Vol. 30)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Hakka Research Department of Jiaying University

客家综论

- 毛泽东的客家观及其实践 曹春荣(1)
- 《寻乌调查》——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 刘佐泉(6)
- 我的客家文化观
- 与程贤章对话录(节选)..... 曾令存(13)
- 客家研究呼唤“比较”..... 胡希张(29)
- 文化传播与权力控制:从传播学的视野看客家文化特质的形成 邹春生(31)
- 全球化对客家文化凝聚力的影响..... 魏丽英(36)

客家社会经济研究

- 梅州地区客家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 谢小康 曾志军(42)
- 闽西客家宗祠的价值与保护..... 蓝达居(48)

客家民俗田野调查与研究

- 浙南汀州村考察记..... 谢重光 兰俏梅(52)
- 大埔县茶阳镇婚嫁习俗调查 谢立言(60)
- 广东始兴县客家婚嫁风俗调查..... 廖晋雄(64)
- 闽西客家“神媒”与北方“萨满”比较研究概说..... 徐义强 陈碧(70)
- 略论“香花佛事”对梅州客家民俗文化的影响..... 李国泰(73)
- 江西龙南关西新围建筑文化研究..... 张嗣介(78)
- 大埔县客家民居之我见..... 罗建忠(84)
- 云南永胜的客家人..... 叶智彰(88)
- “客家”移民文化的踪迹
- 四川中江县金钩村涂家大院往事记..... 涂鸿贵(93)

客家文化艺术研究

- 客家民俗文化美初探
- 从桂东南客家说起..... 彭会资(96)

亟待保护的客家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中的绘画艺术	熊青珍(105)
-----------------------------	----------

客家方言研究

试论南雄市全安镇客家方言地名的命名特征	李中兰(107)
---------------------------	----------

客家妇女研究

从客家民间文学谈客家女性形象及其成因	周晓平(118)
--------------------------	----------

客家名人研究

李金发与象征派诗歌	林运来(123)
台湾客籍作家钟理和的人与大地	
——为孤苦生存的庶民申诉的人道主义初探	潘朝阳(129)
史学大师陈槃庵	郑海麟(140)

客家与中国社会

客家与早期太平天国运动	张道权(145)
论客家宗法宗族文化及其对拜上帝会的影响	张英明(151)

客家新著评论

客家研究中的“文明冲突论”	
——读《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 ...	魏明枢(165)

活动动态

“探索客家族群记忆研习营”活动纪要	李海冬(169)
2006“海峡两岸青年学生客家文化寻踪夏令营”活动总结	张小聪(174)
“纪念罗香林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吴永章 冷剑波(180)
教育部刘凤泰司长视察客家研究院	张小聪(185)
客家研究院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纪实	夏远鸣 冷剑波(186)
传承中华文化的客家学研究与客家文化教育	
——客家研究院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报告	嘉 嘉(188)
客家研究所 2006 年大事记	嘉 嘉(193)

毛泽东的客家观及其实践

曹春荣

(瑞金市党史办, 江西 瑞金 342500)

毛泽东对客家人(即毛氏所谓“客籍”)的关注及其客家观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亦非刻意为之,而是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原由,也就有迹可循。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前途如何?这个问题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内激烈争论过,有人为之困惑、迷惘,甚或沉沦。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却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地方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必然导致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的客观存在中,看到了“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的可能性。^①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思路。然则举国当中,什么地方才利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呢?毛泽东认为应是具备下列条件的地方:(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这样,在大革命(尤其是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福建等省,特别是这些省份的边界山区,自然就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首选之地。而上述各省的山区,尤其是省与省、县与县的交界、插花山区,即通常所谓“山高皇帝远”的“三不管”地带,又正好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客家人,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作的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以及中国革命为冲破帝国主义联合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艰难、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巧合。不过,这种历史巧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已发生多次,例如太平天国革命,例如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都以客家人聚居地为首义之区及大后方。这也正好表明了中国革命和客家人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表明了客家人在中国革命坐标中的固有位置。

饱读中国史籍,并钟情于中华文化奇葩——地方志的毛泽东,岂能对上述情形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关于这一点,目前虽未见到他的论述文字,但从他十分注重客家地区的社会调查,从他对客家源流、秉性的精确了解,不难推论。当他亲自参与并领导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实践后,当他以被他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后,他对上述情形的观察与思考显然更加自觉、理性、系统、全面,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块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全盛时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余万。居住在这一地带的,除了土籍即所谓“本地人”外,还有部分客籍即外来户。先到的土籍占领着生产

[收稿日期]2005-5-27

[作者简介]曹春荣(1944—)男,江西丰城人,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生活条件较优越的平地,掌控着当地绝大部分政治、文化、经济资源。后到的客籍只能退而求其次,占领那些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山地,并承受土籍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社会歧视。由此造成很深的土客籍历史仇怨,很严重的边界各县、尤其是宁冈的土客籍矛盾与界限。这种土客籍矛盾与界限,被土籍地主豪绅刻意渲染、恶意挑起与利用;被共产党内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的领导干部引入工农阶级内部,以至党内,便对革命、对党的建设、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为了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保障革命目标、人民利益的完全实现,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客家观。

二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把土客籍问题作为边界各县党的组织问题之一,作了报告。这是毛泽东的客家观最早、最集中的表露。此外,他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如进行党内教育),也有这方面的表露。综合起来,其内容主要是:

1. 客家人是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南方的,他们居住在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的地带,人口大概有几百万人。

从1928年上溯,至南宋开始是801年,至明代开始是560年,至清代开始是284年。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数百年”,按常理讲,不会是一二百年、二三百,也不会是近千年。那么,就可能是五六百年或七八百年。由此似可认为毛泽东心目中的客家人,是南宋以降由北方徙居南方的中原人,以及明清两代由闽粤回迁赣、湘等地的“老客家人”。按客家人在长江以南的主要聚居区,集中在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及湖北南部的一些县份,并以省际、县际边界地为大本营。这些地方的客家人数,当年估计有几百万人。所以,毛泽东对客家渊源的认识,对客家分布的估量,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是科学的。他对上述诸省——土地革命战争的主战场与大后方,红色政权最有希望首先连片出现的地方,它们的土客籍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也是符合实际、切合革命利益的。

2. 客家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因此,客家人有革命翻身的强烈愿望,欢迎并投向民主革命。

民间向有“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说法,意即谁先到一个地方居住、开发,谁就拥有主导该地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优先权。因此,客家人常常被土籍,主要是土籍地主豪绅视为外来户,低人一等,受尽欺凌压迫。

红色政权未建立时,边界各县的县、乡政权都被土籍豪绅掌控,客家人没有说话权。客家人租种土籍地主的田,不仅要缴纳苛重的地租,还得承受名目繁多的劳役,每年开春还要请田东吃“新年饭”。土籍地主豪绅可以任意凌辱客家人的妻女,客家人只能忍气吞声。客家子弟不能和土籍子弟一起同进一个学校念书。有压迫就有反抗,就会酿成革命。井冈山绿林首领之一的袁文才,就是这样逼上“梁山”,并在毛泽东的亲自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客家人。1926年和1927年的国民革命,客家人表示欢迎并积极支持,以为出头有日,也是这个道理。岂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但是,客家人倾向革命,需要革命,愿为革命毁家纾难的立场与态度,却再次为世人、尤其是共产党人瞩目。毛泽东就特别看重这一点,想办法调动客家人的革命积极性,并加以爱护。他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的种种思考与实践,都有这方面的力证。

3. 土客籍矛盾与对立,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是违反工农利益的。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这类事。

毛泽东观察与思考土客籍问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抛开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跳出剥削阶级为之设定的窠臼。他不是笼统地把土客籍视为矛盾对立的两方;对具体事件的分析评判,也不是简单地说声哪方对,哪方错。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思考、处理土客籍问题。在他看来,土籍人中有剥削者、被剥削者,有革命的、不革命的 and 反革命的。

客家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也会发生变化,也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而反革命的之分。压迫剥削客籍人的,主要是土籍的地主豪绅、流氓地痞。土客籍的矛盾对立,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和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对立,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笼统地提土客籍矛盾,容易掩盖阶级矛盾,不利于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土籍、客籍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他们应当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土客籍矛盾对立问题。^①

4. 不应把土客籍的界限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以免发生无谓的斗争。

边界各县的党员,入党时既无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入党后又未及时接受经常的正确的党内教育,因而思想上有不少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土客籍界限以及与此相连的地方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思想意识带到工农阶级内部,甚至带到党内,引发无谓的斗争,严重危害党的团结,危害革命事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已经成了红军将领的袁文才、王佐被错杀。袁、王被杀原因很多,但袁站在客籍立场行事,龙超清等站在土籍立场行事,偏离了阶级利益、党的利益,却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袁、龙在这件事上的过错、责任不尽相同,有大小、轻重之分)。

毛泽东深知把土客籍界限引到工农阶级内部、尤其引到党内来的严重后果: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土客籍的矛盾对立,反而有利于土籍地主豪绅分化工农阶级,分化共产党,从而从根本上损害客籍人的利益。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党内关切。他认为,在党内要加紧教育,使广大党员明白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明白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县界、区界、乡界,不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也不分你是土籍,他是客籍,而只分谁是哪一个阶级。通过教育,使土客籍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这样做了,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客家人的利益。

综观毛泽东的客家观,我们不难发现它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眼光去审视客家现象及其问题;二是把客家问题置于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大范围内予以考察和研究;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解决客家问题(包括客家内部的、客家与土籍的问题)。

三

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与需要出发,提出并解决客家问题的。因此,他的客家观的成功运用(即实践),也就与此紧密相连。在井冈山改造袁、王部队即其一。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1929年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18个团近3万兵力的重重包围。山上红军粮弹奇缺,衣单不御寒。为粉碎敌人“会剿”,保卫根据地,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出击赣南,一路留守井冈山。为什么选择出击赣南?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的是,赣南有多个县与福建、广东交界,又多山,是客家人的大本营之一。赣南与闽西、粤东,山水相连,声气相通,取得赣南即易于向闽广发展而连成一片。这些有利因素,毛泽东早就了然于胸。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果然如鱼得水,听得懂客家话,吃得惯客家饭,做得了客家活,真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这里的人民群众也待红军如亲人,愿跟红军闹革命。毛泽东于1929年4月5日在瑞金写给中央的信中,就动情地说道:“瑞金民众如火如荼的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指出“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从而向中央提出了近期“争取江西,

^① 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33-3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的战略决策建议。^①这个建议后来化作创建以瑞金为中心的,包括客家人占大多数的赣南、闽西连片地块的中央苏区的现实,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客家观的正确。

为了启发客家工农的阶级觉悟,激励他们的革命意志,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水平,毛泽东想方设法了解客家、熟悉客家、亲近客家工农。他最常用的办法便是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取得对客家问题的发言权。

1928年春,他做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加上此前的湘东五县(毗邻赣西)调查,使他弄清了湘、赣、闽、粤等省客家的来历与分布,明了了他们在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感受到他们要求翻身的迫切愿望和对于国民革命失败的沮丧心情,及至熟知他们的民性习俗,他们和土籍的历史的、现实的仇怨。因而,他得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慎重地提出土客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后,毛泽东对客家社会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更勤更多了。这固然因为赣南、闽西(还有粤东即梅州地区,这里也是后来的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是国内最大一块客家人聚居区,其中不少县如赣南东部诸县、闽西汀州府属各县、粤东嘉应州属各县,还是纯客县,其居民的绝大多数都说客家话。而如何正确认识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中的客家社会的异同,并据以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也应当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大量社会调查的一个动因。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大家都说客家话的纯客县,是没有如井冈山那边极其分明的土客籍界限的。这里的客家问题的重心,也就与井冈山那边会有所不同。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做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以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多个农村调查。虽然,在这些调查中,毛泽东并没有单独把客家问题作为重要内容列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也没有单独报告上述各地的客家情况,以及与土地革命相关的客家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忽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还可以推想这是毛泽东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处理客家问题的必然结果。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调查报告所涉社区、事件、人物、风俗、语境等,基本上都是客家的,这就够了。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第一个大型的社会调查。“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②这就是毛泽东选择此地搞社会调查的最初想法。又因为寻乌是纯客县,明了了这里的客家情况,三省交界各县,以至南中国的客家情况也就大体清楚了。

《寻乌调查》全面而精详地揭示了该县自然、社会之历史与现实状况,尤其是这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当时的土地斗争状况。从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客家工农受同是客家的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透过温情脉脉的宗族祠堂、神坛寺庙、桥会文会的面纱,看到客家社会内部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对劳苦工农的巧妙压榨。从中我们还能深切感受到客家风俗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与影响。例如,寻乌风俗,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住户在他家里生儿子,以为那样,他一家的“精灵”会被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由此毛泽东想到土地革命中的房屋分配,应由“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按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③又例如,寻乌风俗不赞成移民搬家,“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地理原因等。其实,“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宝贵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的。”^①。

仅从以上所述,我们便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客家社会调查,对他实践自己的客家观,更为有效地发动、指导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为实践自己的客家观,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与党内教育。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增至八项注意),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共产党员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原则。他耐心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八字”、风水、菩萨,讲究宗族祠堂、地界姓界等封建观念,树立阶级观念、科学观念。他用敌人做反面教员说,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那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他在培养土籍干部的同时,也注意培养客籍干部。特别是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设法把客籍干部培养上来,并由他们担任当地的主要领导。建立、发展党组织,也十分注意这一点,重视发展客籍中贫雇农党员。与此同时,在经济上也注意土客籍群众一律平等,比如分田,不把坏田分给客籍农民。^②通过这些努力,使土客籍工农群众觉悟起来,振奋起来,消除彼此界限,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在实践自己的客家观方面,毛泽东还很注重政策策略的运用与调整。他一向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③解决客家问题,也靠正确、坚决的政策策略。

井冈山时期,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放言客籍将要杀土籍,致使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你来我往、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土客籍对立情况,还反映到党内,引发无谓的斗争。对此,毛泽东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④与此同时加紧党内教育,使土客籍党员率先团结一致。通过上述努力,边界的土客籍对立状况大为改善。

毛泽东对袁文才、刘辉霄、王佐等的用人策略也是有讲究的,那就是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并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有步骤地促使他们进步和走向革命。上述三人都是井冈山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但袁是客籍人,刘是土籍人,而且是袁的对手龙超清(土籍)的好友。王虽为土籍,但与袁是洪门会的拜把兄弟。如此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容易被土客籍关系掩盖。毛泽东为此颇费思谋。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下山,毛泽东调袁文才当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当前委秘书长,王佐留守井冈山。毛泽东的想法是把袁、刘带出去开阔眼界,以利于他们的世界观的转变。另外,把这对矛盾体带在身边,也有利于井冈山的内部稳定。可惜的是,袁、刘半道折返井冈山,酿成袁、王被杀悲剧,辜负了毛泽东一番良苦用心。^⑤

总而言之,毛泽东对客家问题的思考与实践,都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而这一方面,在过去的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中,似乎并不多见。但这确实是个重要而有趣的课题。本文倘能抛砖引玉,则不胜欣慰之至。

(校对:房学嘉)

①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33-3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 陈伯钧:《井冈山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53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寻乌调查》——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

刘佐泉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研究所, 广东 湛江)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赣州作为江西南大门和广东“邻居”,是客家先民和后裔的中转站和返迁地,是客家文化、客家民系的摇篮。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寻乌调查》遂于1930年春夏之交在毛泽东的足下、笔下问世。

在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登门访问,直接观察和调查会等方式。在写作上,毛泽东运用了统计分析、剖析典型等方法,并大量的使用客家方言。在内容上,不仅为客家学的研究提供经济、政治、文化、歌谣、语言……的珍贵材料,为客家族群生活、民俗、风尚……留下了鲜明的记录,而且提供客家民系对歪风陋俗进行自省之资。在时间上,《寻乌调查》比被被誉为“国内最早一部对客家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力著”——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11月希山书藏初版)早三年半。

所以,说《寻乌调查》是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是实至名归,名实相符的。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今天的客家学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是具有启迪作用的。

70多年来,人们只注意到《寻乌调查》的实际意义——“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等许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据”^①,而忽视了为后人研究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客家社会的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具体的历史资料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拟对后者作一探索,以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一

1930年春,红军部队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北的平远一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就为寻乌调查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对此,毛泽东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就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借给材料的人。”^②“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启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不胜欢喜。”^③于是,毛泽东就以寻乌为调查点,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和组织下,对寻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于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比较广泛,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从职业上说,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农民、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穷秀才,有小学教员,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从年龄上说,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岁,最年轻的是23岁。在这些人当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做过商会会长)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

[收稿日期]2005-9-20

[作者简介]刘佐泉(1935—),男,广东兴宁人,湛江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代表作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观澜溯源话客家》、《太平天国与客家》等。

① 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维埃委员),为这次调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登门访问、直接观察和召开调查会等方式。其中主要是找了11个人,在寻乌的马蹄冈,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开会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亲手记录,亲自提问题。除了开调查会外,他还做了20多天实地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例如:毛泽东问一个杂货店主:“你这个寻乌城有几家杂货店?有多少种杂货呀?”有几家杂货店答上来了,至于有多少种杂货却说不清楚。毛泽东不着急,放下笔慢慢问:“你们这里的信封信纸,一种是从赣州来的,是本国制作的;另一种是梅县来的,是用‘洋纸’做的吧?”那店主连忙点头说:“是的,是的。不过‘洋纸’便宜些,卖得快。”毛泽东又问:“你们这里卖的竹帘、竹纱也是梅县来的吧?”陪同毛泽东来的古柏说:“那是香港货,是从梅县转到寻乌的。”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店主和店员的关系如何?一个月给店员多少钱?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过年过节允许不允许回家?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毛泽东又问:“听说你们店员里除了雇工,还有一种叫‘等郎嫂’的,对吗?”店主说:“有是有,不过我那个店里没得。”毛泽东又问:“你们说说这‘等郎嫂’是什么意思?”那店主想了想,说:“有的店主人手少,便花钱买一个年少的女子来做工,店主还没有小儿子,要等老板娘肚子大了,儿子生出,才能结亲,这就叫‘等郎嫂’。”毛泽东点点头,记下了他的发言。^①

同时,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

为了研究寻乌城商业发展情况,毛泽东从寻乌市场所经营的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市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他细心地分析了5家盐店、17家杂货店、1家油行、1家豆行、10家酒店、7家水货店、7家药店、2家黄烟店、16家裁缝铺、10家旅店、8家理发店、7家首饰店……。为了研究杂货店的生意,毛泽东搞清了杂货店经营的全部内容,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钢笔、铅笔等131种“洋货”的名称,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电筒、洋火、信纸等23种最畅销的商品。他了解了水货店经营的内容,以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等11门产品为主,海参、香菇、云耳等28种为次,详述了这39种土特产品、水产品在寻乌的销售情况。在调查寻乌的圩场生意时,他详列了圩场交易的各种货物,如鱼、小菜、竹木器、水果等等。此外,调查还涉及到妓院、会道门、神坛、社、庙、寺观及祖宗祠堂的情况。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是决心要把城市问题了解清楚的。所以这次到了寻乌,他便把这个城市的结构进行一番解剖。他把这座近2,700人的城市按照行业进行了统计,分别算出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地主、宗教徒等所占的比例。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发现:寻乌城“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②。因为在这个县城的居民中,占第一位的是农民,有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占第二位的是手工业者,297人,占11%;农民和手工业都共占71%。由此看来,这个城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毛泽东便发现了寻乌这个城市的基本特征。

通过调查分析,毛泽东还发现寻乌这个撮尔山城中的游民和娼妓占着相当大的比例。占寻乌城人中第三位的便是游民,这些“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都几乎相等。”占人口第四位的竟是娼妓。“‘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³⁰几个妓女,养活着162人,比商人的总人口总数还要多。如果把游民和妓女人数合起来,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毛泽东说:“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

^① 刘学琦:《毛泽东风范辞典》,第319—32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

^②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为节省篇幅,以下凡是《寻乌调查》中的引文不再另注。

为了弄清寻乌城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毛泽东非常巧妙地“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总共分成 20 余项,如:

盐:城里第一大宗生意,分潮盐、惠盐两种:全城五家盐店,每年可做 10 万元生意。
杂货:共有十六七家杂货店,商品以布匹为主,洋货次之;寻乌市场有洋货 131 种,其中 23 种销售最多。

油:一家油行,代客买卖,年经手 1,300 担油,抽行佣 260 元。
豆:一家豆行,全年生意 1,000 担,收行佣 300 元。
酒:七家酒店卖黄酒,共约 700 元生意;三家酒店卖白酒,约 1,000 元生意。
水货:七家水货店,销售咸鱼、海带等 11 种主要产品,另有鱼翅、鱼肚等 39 种次要的水产品。
药材:七家药材店,共约 6,000 元生意。
黄烟:两家黄烟店,自己加工黄烟销售。
伞:两家纸伞店,生意大不如前。
木器:只一家,产品主供地主、商人用。
豆腐:城内 30 多家豆腐店,属“居家生意”,既磨豆腐又耕田。
理发:八家理发店,每店 1-3 人。
裁缝:机器缝衣 13 家,通常是一架缝纫机,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另有手工做衣 3 家。
伙店:就是旅店,有 10 多家,客人以挑担子的为多。
打铁:3 家打铁店,专打篾刀、柴刀等农具。

由于进行了这样深入细致的剖析,毛泽东把寻乌城整个工商业的情况可以说做到了了如指掌。
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对两个地区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分别进行了统计,有了这样的统计,我们便可以把这两个地区的状况,拿来进行比较、分析,并使调查的结论具有可靠的根据。

寻乌、兴国农村人口构成状况(1930 年):			
寻乌(全县)		兴国(第 10 区)	
大地主	0.045		
中地主	0.4%	地主	1%
小地主	3%		
富 农	4%	富农	5%
中 农	18.25%	中农	20%
贫 农	70%	贫农	60%
雇 农	0.3%	雇农	1%
手工工人	3%	手工工人	3%
游 民	1%	游民	2%
		小商人	3%

寻乌、兴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1930 年):			
寻乌(全县)		兴国(第 10 区)	
地主占田	30%	地主占田	40%
公 田	40%	公 田	10%
农民占田	30%	富农占田	30%
		中农占田	15%

此外,还有寻乌的六种主要出产:米、茶、纸、木、香菇、茶油的出口价值统计、物价统计和工资情况记录等等。^①

二

在寻乌调查之后,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布圩,对调查到的大量的丰富的材料进行整理加工,以具体的事实和统计数字,采用了赣南客家的富于特色的方言,描绘了这个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县城内外的社会生活风貌。

寻乌人多“一姓住在一村”,即聚族而居,且多建祠堂,立有公会,拥有田产,年年收租。祠堂属下子孙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二是“房股肉”;三是“老人肉”;四是“丁肉”。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

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山地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路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菇或树卡(开树本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这就是家族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

在家族主义统治下的寻乌农民因封建剥削的严重,不少人过着“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啊嘴(没有了)”。这,正是民歌所唱:

月光光, / 光灼灼。 / 埃(涯,我)跌苦, / 你快乐。 / 食也毛好食, / 着也毛好着。 / 年年项起做(继续做), / 总住烂屋壳。 / 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毛钱讨, / 害埃穷人样得老(怎样得老)。 / 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埃毛分, / 有眼当个瞎眼棍。 / 天呀天, / 越思想越可怜。 / 事业毛钱做, / 年年总耕田。 / 六月割也就(刚割完), / 田东做贼头。 / 袋子一大捆, / 擎把过街溜(洋伞)。 / 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 / 问谷曾晒就? / 穷人一话毛, / 放出下马头(打官腔)。 / 句句讲恶话, / 俨然税户头(大地主)。 / 唔奈何, / 量了一箩又一箩, / 量了田租量利谷, / 一年耕到又啊嘴! / ……

《寻乌调查》还揭露了捐税剥削的严重。毛泽东曾详细谈到县署钱粮给征柜上的几种陋规:如银水、过割礼、填写礼、券票礼、点规、过节礼、过年礼等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官府剥削农民的种种办法。但这些“陋规”,具体怎样实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由于参加调查会的 27 岁的刘亮凡,原是县署钱粮兼征柜的办事员,现在是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由于他提供了亲身所见的资料,于是便揭开了旧县署征收粮税“陋规”的全部秘密。

^① 刘兆辰:《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第 77-82 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调查》写到寻乌县的剥削状况时，曾谈到农民有被高利贷债主逼迫，被迫“卖奶子”（卖儿子）的事实。富福山村的刘亮凡说，他那村里37家人，分属刘、曹、陈、林、黄5姓，共有5家卖过儿子，其中3家姓刘。买主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卖价每个孩子100元到200元。但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刘亮凡还说，除了本村之外，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据到会的3人估计，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有10家是卖过儿子的。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蒔田、耘田、捡草、铲田、墾田、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碓谷、踏碓、淋园、蒔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女儿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寻乌妇女还流行着戴首饰的风俗。毛泽东说：“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为什么“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要戴这种东西呢？这自然还是要从人们的社会心理上去解释。这些女人越穷越怕人瞧不起，那怕戴个“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的假首饰；也是满足这种心理要求。

寻乌人是多神崇拜者。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寺庵有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栋、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等等。道观有云盖栋、大山里、川塘坑等等。

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200多人，一个天主堂100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100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100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5个700人左右，天主堂100多人，共800多人。

寻乌还崇敬“伯公”——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埂下，山凹上，什么地方都有他。

寻乌农村还保持着一种办“社坛”的风俗，这是一种传统习俗。每村都有一个社坛，即使只有三家人的小村也有个社坛。每个社都有会，会期一般是每月初二。开会时不论贫富，每家都要来一个人。人们首先杀猪买酒大吃一顿，然后一起开堂议事。谈的都是有关本村生产的事，“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为什么各村都要办社坛呢？因为人们企盼它“保护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这就是说，由于社坛能够给人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所以这种风俗能够长久而不衰。

以不满3,000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30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的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酿豆腐。”

发式是人们的一种时尚，民国元年以前，人们一律是梳辫子，理发一律用旧式的剃刀。民国元年开始用洋剪理发，样子一概是和尚头。民国2年开始兴“东洋装”，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

装”，民国 10 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是寻乌到赣州读书的学生传来的。民国 12 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广东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毛泽东在这里概述了西方新式发型在客家地区流行的历史。他还说：大革命时，“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

毛泽东上述深刻入微的描述，从平平常常的理发看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山区的客家社会的影响，确实是难得的材料。

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影响的另一方面是部分寻乌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毛泽东对寻乌的文化列了一节加以叙述。他说：全县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识字的不过 300 人），但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而且靠近广东的南半县要比北半县更发达。毛泽东对全县男子的文化水平通过列表作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寻乌大体上的文化状况：

不识字	60%	识字	40%	识字 200	20%		
能记帐	15%	能看三国	5%	能写信	3.5%	能做文章	1%
初小学生	5% (5,000 人)	高小学生	8% (8,000 人)	中学生	500 人		
大学生	30 人	出洋学生	6 人				
秀才	400 人	举人	1 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毛泽东在分析中指出：高小生多于初小生是由于许多学生没有上初小、读蒙馆后直接进入高小。高小学生部分是小地主子弟，中学生则全部是地主子弟，其中小地主占多数。大学生则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这一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那些地主特别是中小地主，普遍重视子弟的教育。他说：“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除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则主要是破落户这一阶层的社会心理所决定的了。

三

从毛泽东的整个行文来看，他自己是要把《寻乌调查》写成具有可读性的著作。为此，剖析典型，小中见大：

郭怡和杂货店的盛衰，是全县商业变迁的一个缩影。这家杂货店在清光绪二十五年时，曾是“寻乌城是第一家大商店”。店主是现在店主郭友梅叔叔，做了 60 年杂货生意。有 3,000 元本，却做得 20,000 元上下的生意，因为许多商品如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等是从赣州方而赊购来的（当地称“缴”）。“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钱，就可以拿动。”但现在不行了。赣州、梅县、兴宁的商店“都缴不动”。因为本城农民本来就穷，又遭了旱灾，还不起本城商家的帐，本城商家也还不起赣州、梅县、兴宁商家的帐，这样买卖就越做越小，一年不如一年。民国 5 年，郭怡和店遭到官军“一个大抢”，抢去 6900 多元东西，这样这间店就衰败下来，剩下百多块钱本，成了“本钱最小的杂货店”。

潘明征是寻乌大地主的典型。毛泽东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地主阶级三代人不同的思想和生活道

路。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是寻乌头号大地主,他的家产包括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同时还在吉潭圩上开着药店和杂货店,共计价值30万元,仅田地收租就达10,000石左右。潘明征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本人思想非常顽固。他的儿子就与他不同,他们主张办学堂,但办出的学堂还是“半新不旧”的;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做过县财政局长,三多子潘梦春“文理不通”,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堂,却当了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很有实权。后来当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又当上了寻乌县长。潘明征的孙子们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们纷纷外出读书,研究“新学”,有六七个孙子去广州、上海、北京读书,还有一个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是个西医好手,每月收入千多元。

范兴甫是卖山珍海味水货店的店主,有三四百元本钱,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范家的兴衰也很典型。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3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800担谷。清末民初,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7家店子,做绸缎、布匹、杂货、水货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11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14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给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

如此着力刻画家庭、分析家庭,是《寻乌调查》的第一个突出特色。

其次是大量使用客家方言词语和句式。如:

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

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油、豆、盐在这里过驳/三个份子,吊多钱本

有零年了/衰下来/“打斧头”、“打雷公”,“吃油饼”/有点把子/顶大门/现在了了

“并背罗食使”/两毛子一斤/“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

“猪妈带子”/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

“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水浸牛皮——很吝”/“闲霸”

总之,这份写于1930年5月的包括有五章39节104个纲目的《寻乌调查》,是“中共党风规模空前、内容洗繁的一部社会档案”^①。而实际上就是一部客家社会档案。这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同时,还为客家人生活留下鲜明的记录是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著作。

(校对:吴永章)

^① 蒋伯英:《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第305页。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我的客家文化观 ——与程贤章^①对话录(节选)

曾令存

(嘉应学院中文系,广东梅州 514015)

一、大写的客家人

曾令存(以下简称曾):我们谈谈有关客家的话题,包括你的创作与客家的关系,客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客家人的精神品格,客家历史与人文,等等。你的创作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跟你家族与个人经历的关系,特别是你的父亲母亲对你的影响,从“土改”到“大跃进”、“四清”,到“文革”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你的编辑记者生涯;另外一个是与客家有密切的关系。我在《仙人洞》的“代跋”里也写到,你从上世纪60年代的《俏妹子联姻》到70年代的《樟田河》,80年代的《彩色的大地》、《胭脂河》,90年代的《青春无悔》、《神仙·老虎·狗》、《云彩国》、《围龙》,一直到这几年出版的《大迁徙》、《长舌巷》、《仙人洞》,客家始终都是你文学创作的艺术王国。有评论家说如果把你近50年的创作串联起来,从中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粤东客家山民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上世纪末的一次座谈会上,你也曾说你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你身上流的是客家的血液,你的性格是客家的典型,你的作品写的都是客家的生活,——你说:写客家100年内没有人能写得过我。我觉得你这么说是想强调你的创作跟客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程贤章(以下简称程):这个我想分几点来说。第一,我说写客家一百年内没人能写得过我,是在20世纪末1998年秋天的《围龙》座谈会上。这个世纪即将结束,所以这个世纪写客家可以说没人能写得过我。他们都是断断续续变成一个支流,我的作品写的是从大迁徙到一个客家大家族这一百年的风云际遇,我感到打着客家的旗号写大写的客家人我是领先的。

曾:从这一点讲,可以说没有人能写得过你。我想还可以加上一点,就是,虽然也有不少人也在写客家,但是没有人像你这么完整地走上文学就写客家,一直写到《围龙》,写到《大迁徙》,写到现在的《长舌巷》、《仙人洞》。客家成了你小说的文学世界,这有点像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

程:沈从文也好,贾平凹也好,我看他们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圈子,那就是一种乡土情怀。我最先也不知道什么是客家文学,就是从一种乡土情怀开始写。“俏妹子联姻”也好,“清明时节”也好,包括清明节吃清明糕,这些东西都是百分百的客家人生活。我那时候就是把自己定位为写乡土情怀的角色,后来随着整个客家研究的不断深入,回过头来,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客家的文学。无论短篇长篇,我都是写客家的东西。我在汕头住了10年,但关于那里的生活,在《青春无悔》里写还

[收稿日期]2005-11-20

[作者简介]曾令存(1964-),男,广东梅县人,嘉应学院中文系教授。

①程贤章(1932-),广东梅县人,国家一级作家,原广东文学学院院长。

不到半本书;在珠三角住了 20 年,只在办《风流人物报》时写了一些关于珠三角企业的报告文学之类的东西,从未写过关于珠三角风土人情的小说,哪怕是一个短篇。我写作的世界全是“客家”的。

曾:住上 10 年 20 年,还是客家故乡的情怀。就像沈从文说的,在城里住了 10 年,自己还是乡下人。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写作除需要现实生活素材外,还需要一种记忆的资源,这种资源必须由相应的情境激活。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童年的记忆太深,客家文化的积淀太厚,塑造着你这种客家情结?

程:可以这样说。这个客家情结也是由于爱家庭、爱父母、爱宗族,发展到爱客家,感到客家这块热土使我产生灵感,写起来得心应手。

曾:我觉得你从这个方面来讲客家同你创作的关系,是非常有道理的。

程:到 90 年代写《围龙》的时候,我就公开打出“客家”的旗号,我写的是“大写的客家人”,而不是只在考证什么是“客家”。小说中我写了两个人,一个是以熊德龙为模特的韩辉、一个是以日本人三浦喜吉为模特的大野。这两个人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客家人,不是客家的血统,但他们又是真正的客家人。谁能够做到像熊德龙那样要走的时候跪下来吮母亲的奶头,回来时拜完父亲后也要吮母亲的奶头,这可能就是宗教里的母亲崇拜意识。

曾:实际上你一直都在写客家,写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这种意识愈来愈强烈,而且把客家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大雅,不再局限于梅县,不再局限于闽粤赣边,不再局限于中国,而写到那些具有客家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的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大写的客家人了。

程:这一点我很执着,我认为只有写“大写的客家”,写“大写的客家人”才有出息。

曾:提出“大写的客家人”,你应该是第一个。这里,你扩大的其实不仅仅是“客家”的地域空间,更重要的是关于“客家”的文化思维空间。理解你这点很重要,否则难以进入你的小说世界。实际上,写到《围龙》的时候,“客家”在你的意识中已经不再是单纯血缘或者地域意义上的“客家”,而是文化意义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上的“客家”了。如果说突破和超越,我认为这就是;要说《围龙》在写客家方面的贡献,我以为这点不应该忽视。关于这一点我在《试论〈围龙〉的历史观》一文中特别提到,我谈到《围龙》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胸怀”。有了这种历史的胸怀,我们便不会再耿耿于怀于小说所写的“大写的客家人”。我以为“客家”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实也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把“客家”的涵义“经典化”,它应该是个开放的、多维视野中的概念。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用“血缘”、“地域”、“语言”等诸多术语去探究、描述“客家”,但面对鲜活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则没必要桎梏于此,作茧自缚。换句话说,从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层面上去探究何谓“客家人”,也许更能触及其本质内涵。《围龙》中的大野(袁和平)和韩辉这两个客家人的形象,显然不是血统意义上(一个是日本血统,一个是印度血统),而是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意义上的。有意味的是,你不仅把他们当作客家人的形象来刻画,甚至还把他们塑造成为优秀的客家人,赋予他们以许多“客家”的优秀品格,让许多窝居在围龙屋内的,有所谓正统客家血统的客家人黯然失色。从传统的客家研究眼光看,你这样去阐释“客家人”,正如你在小说“后记”中说的那样,实在有些“不肖”,该受“杖责和拷问”。但换一种视角,我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即这其实是你“杖责和拷问”我们正统“经典”意义上的“客家”和“客家人”呢?客家研究进入 90 年代后,出现了一种“泛‘客家’”倾向,见风是雨,把“客家”说得漫无边际,当作商品标签,这实际上是贬损了“客家”的品格。正因此,我才觉得你在小说中通过大野和韩辉的形象去探究“客家人”的涵义,比那种迷迷糊糊自我膨胀地把郭沫若邓小平等比较有名望地位的都贴上“客家人”标签的劳作要有意义得多。《围龙》关于“客家”这种“越轨”的探究与阐释,我以为很能展露你对“客家人”观念理解的一种历史胸怀。这种多少有点出格的“客家人”观念,隐含着你对客家人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深远历史渊源与背景的沉思。事实上,在大